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一九五三年·北京

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平裝本定價一萬五千元

一九五三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二次印刷

累計印數 800,001—1,100,000冊

書號 1—3

目錄

抗日戰爭時期(下)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七六九—七七四
序	七六九
跋	七九三
改造我們的學習(一九四一年五月)	七九五—八〇三
揭破遠東慕尼黑陰謀(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八〇五—八〇六
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綫(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八〇七—八〇八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八〇九—八二三
整頓黨的作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八二三—八三〇
反對黨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	八三一—八四七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	八四九—八八〇

引言

八四九

結論

八五四

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

八二一—八四四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八五五—八九〇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

八九一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九四二年十二月）

八九三—八九六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

八九九—九〇四

質問國民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九〇五—九一二

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

九一三—九一六

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九一七—九三〇

組織起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九三一—九三九

學習和時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九四一—九五四

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

九五五—一〇〇三

爲人民服務（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一〇〇三—一〇〇四

評蔣介石在雙十節的演說（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

一〇〇五—一〇〇八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綫（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一〇〇九—一〇一一

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一九四五年一月十日）	1031—1039
游擊區也能够進行生產（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1031—1034
兩個中國之命運（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1035—1038
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1039—1040
一 中國人民的基本要求	1039
二 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	1040
三 抗日戰爭中的兩條路綫	1041
中國問題的關鍵	1043
走着曲折道路的歷史	1044
人民戰爭	1046
兩個戰場	1047
中國解放區	1048
國民黨統治區	1049
比較	1047
『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的是誰？	1049
所謂『不服從政令、軍令』	1050
內戰危險	1051

談判.....一〇五二

兩個前途.....一〇五三

四 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一〇五四

我們的一般綱領.....一〇五五

我們的具體綱領.....一〇六三

中國國民黨統治區的任務.....一〇八八

中國淪陷區的任務.....一〇八九

中國解放區的任務.....一〇九一

五 全黨團結起來，為實現黨的任務而鬥爭.....一〇九四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二〇一二—二〇四

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四月

二十七日）.....二〇五一—二〇九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一九四五年七月十日）.....二二—二四

評赫爾利政策的危險（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二日）.....二五—二六

給福斯特同志的電報（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二七—二八

對日寇的最後一戰（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二九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

(一九四一年三月、四月)

序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

現在黨的農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一〕，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爲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裏担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担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說，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

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說，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裏印的，主要的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者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郎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够。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羣衆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說，中國幼稚的資產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產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說，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說。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說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二)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羣衆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跋（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

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但這是指的關於如何聯繫羣衆和動員羣衆反對敵人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線這一方面。黨的策略路線，在現在和過去是有原則區別的。在過去，是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在現在，是聯合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產階級。就是在十年內戰的後期，對於向我們舉行武裝進攻的反動的政府和政黨，和對於在我們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反動的政府和政黨中各個不同的派別間，也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這些也都是不正確的。那時，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產者以外的一切社會成份，執行了所謂『一切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無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對於十年內戰前期和中期所採取的，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爲匪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正確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現在，黨的政策必須與此不同，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綫，但對他們中間存在着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

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又規定農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兩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產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份，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着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份，並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產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鬥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份。我們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中國共產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幹部，必須鍛鍊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註釋〕

〔一〕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的中央指示，是指當時所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決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即本書第二卷所載『論政策』一文。

〔二〕引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

〔三〕這裏所說的十年內戰前期，是指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二八年底的時期，亦即人們通常所稱的井岡山時期；中期是指一九二九年初至一九三一年秋的時期，即自中央紅色根據地的創立至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的時期；後期是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的時期，即自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結束後至黨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時期。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內的統治，使黨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參看本書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改造我們的學習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和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對於這些的認識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抗日戰爭以來，我黨根據馬克思列

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戰爭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和世界，是進一步了，研究中國歷史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二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據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像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和國際的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是對於國內和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和國際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報告。這篇報告和「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關於整風運動的基本著作。在這些文章裏，毛澤東同志進一步地從思想問題上總結了過去黨內路線的分歧，分析了廣泛存在於黨內的偽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主要是主觀主義的傾向，宗派主義的傾向，和作為這兩種傾向的表現形式的黨八股。毛澤東同志號召開展全黨範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即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原則整頓作風的運動。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號召，很快地在黨內和黨外引起了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大論戰，鞏固了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外的陣地，使廣大幹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

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並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系統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客觀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的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的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雖則有少數黨員和少數黨的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地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地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的革命經驗，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的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並不是爲了革命實踐的需要，而是爲了單純的學習。所以雖然讀了，但是消化不了。只會片面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這種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的幹部，害處更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現狀，不注重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

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的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中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檢來的。

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鮮事物和創造新鮮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給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在延安學了，到郿縣（二）就不